



古典学译丛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

东方化革命

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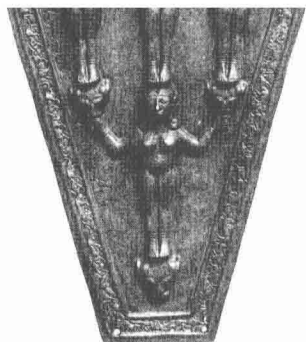
[德] 瓦尔特·伯克特 著 刘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古典学译丛



丛书主编 阮 炜 曹亚军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by Walter Burkert

东方化革命

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德] 瓦尔特·伯克特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德)瓦
尔特·伯克特著;刘智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9

(古典学译丛)

ISBN 978-7-5426-3320-0

I. ①东… II. ①伯…②刘… III. ①文化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621 号

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著 者/[德]瓦尔特·伯克特

译 者/刘 智

责任编辑/黄 韬

特约编辑/汪丽娟

装帧设计/范晓青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8.75

书 号/ISBN 978-7-5426-3320-0/C·370

定 价/32.00元

“古典学译丛”出版说明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的学问高明。及至清末，中国的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有了初步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1937年至1949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1950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定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等。1990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苗力田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四卷本，王晓朝译）。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

东方化革命

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和《希腊志》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这样一个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著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革命和运动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部分。几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稍稍像样一点的西方大学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当然,国内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的引进并非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二三十年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炫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全球既有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动。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超越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对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但中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相对滞后,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未来中国不仅应当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还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建设,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仍然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研究,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介绍到中文世界,应当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

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极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尴尬。甚至一些学术名人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家早已站立起来了,却一直不能形成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中国视角的希腊、罗马研究。

目前西方古典学每年都有大量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比如说,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妇女服饰;比如说,西元前4世纪中叶以降的希腊雇佣兵;再比如说,练身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令人遗憾的初级阶段。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近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所以宜选择专题性更强的新近研究成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消化西方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古典学译丛”编者、译者

2010年3月

导 读

没有哪个西方人会否认，西方文化可以溯源到古希腊。但并非每个西方人，甚至并非每个西方学者，都承认西方文明的源头不止在古希腊，而是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即古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叙利亚、腓尼基的文明。在承认这些文明影响的西方人中，也有爽快地承认和不爽快地承认之分。所谓“爽快地承认”，指学者们不光在态度上爽快，而且不厌其烦、不畏艰辛地做细致的考证工作，把东方影响的细节一一发掘并呈现出来。所谓“不爽快地承认”，是指但凡遇到东方影响绕不过时，便支支吾吾，语焉不详，尽量淡化、简化、抽象化，或仅只提及，一笔带过。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 1931—)属于前一种人。

在他的《东方化革命》(*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1992)出版之前，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所做的工作能够让人如此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认识，即东方文明对古希腊的影响并非局部性的、微不足道的，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伯克特甚至认为，在西元前 7—前 6 世纪即希腊人刚刚进入历史前台时，东方影响在希腊引发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他称之为“东方化革命”。伯克特现为苏黎世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是西方首屈一指的古希腊宗教专家，其《希腊宗教》(*Greek Religion*，德文版 1977，英文版 1985)在古典学界已是经典。正是在研究希腊宗教的过程中，他发现希腊宗教与古代“近东”宗教有着至为密切的承续关系；不厘清这种

关系,便不能准确地认知希腊宗教。这便是《东方化革命》的写作背景。

《东方化革命》虽用德文写成,但其英文版并不是原文的简单翻译,而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措词也进一步完善。该书以详实的史料和丰富的考古成果证明,古希腊文明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奇迹,而是从一开始便受到古代埃及和西亚文明的全面影响。在西元前 8—前 7 世纪,从东方来看,亚述帝国在迅速扩张,腓尼基人的商贸活动正方兴未艾;从爱琴海地区看,希腊人也正积极在东西两个方向探索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西亚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种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活跃的局面。在《东方化革命》中,伯克特不仅探讨了东方人的商品、工艺品、技能和艺术对希腊社会的冲击,也深入研究了东方工匠、商人在希腊世界的活动,甚至对东方的巫医、魔法师一类人对希腊社会的渗透也给予相当程度的关注。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东方的技术、科学,带来了东方的诗歌、神话,也带来了东方的字母和书写理念。东方文化的输入极大提升了希腊的文明水平,使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希腊人对古代东方文明中的汲取如此之深,如此之广,完全可以说此时希腊发生了一场“东方化革命”。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在西亚地中海世界位处边缘、默默无闻的希腊人突然间崛起了,表现出了一种可谓爆发性的创造活力,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文明史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态。希腊的崛起乃至卓越,固然有自然条件方面的重要原因;^①但地理位置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为什么长期以来,希腊在西亚地中海大世界位处边缘、默默无闻,却能一直保持独立,幸免于被强大的埃及帝国、亚述帝国或波斯帝国吞并掉?这里,希腊所处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最佳答案。正是由于希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②它才得

① 参见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一章“环境造就了希腊”。

② Chester G. Starr, *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 1100—650 B. C.*,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unlisher), 1961, pp. 194—195, p. 199, pp. 200—201, 及全书各处。

以既保持政治独立,同时又能方便地从东方“拿来”,有选择地利用东方文明的一切成果。看来,“拿来主义”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

其实希腊之能方便地“拿来”,同时又无被吞并之虞,也凸显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希腊文明并不是一个原生文明,而是建立在多个原生文明——主要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基础上的一个后发或次生文明,一个大约在西元前 7—前 6 世纪经历了“东方化”或“东方化革命”的文明。众所周知,亚欧大陆产生了四个大河文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这就是所谓“四大文明”。这些古代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大河中下游或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那种干旱、贫瘠的土地上甚或交通不便的山区。为什么四大原生文明都萌生在大河流域?

这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掌握的技术极有限,只有在大自然挑战程度适中的条件下,只有在大河流域,才能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汲取较多的农业剩余;只有掌握了较多剩余,原生文明,即具有长久生命力并能为后起文明提供强大推力的伟大文明,才能萌生并顺利成长。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仅适宜大规模农耕,而且地势平坦、水道密布,与重峦叠嶂的山区相比,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更有利于技术发明、思想理念的播散,也更有利于文明本身的诞生和繁荣。

毋庸讳言,除了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连续性外,其他三个原生文明早在西元纪元之前(或至迟至于西元 7 世纪)便衰落了,或者说都经历了严重的文化断裂或生命形态的深刻转型。尽管如此,它们无不对后发的各个次生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无不通过次生文明而对现代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换一个角度来讨论同一个问题,则可以说,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没有一个次生文明不是在原生文明的深厚、丰腴的基质上成长起来的。古希腊文明便是这样一个次生文明,一个典型的次生文明。

明白了这一点,前8世纪希腊世界在经济复苏之后出现的爆发性文化繁荣,或者说希腊人在艺术、宗教、文学、科学、哲学诸多方面取得的成绩,便不难解释了。很显然,这种文化繁荣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西亚、埃及两千多年文明演进的深厚基础之上。

纵观西元纪年后亚欧大陆的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没有一个新兴文明——无论是古典时代、中世纪还是现代的,无论在西亚地中海世界,还是东亚、南亚、东南亚——能够不汲取某个原生文明的养分而发展繁荣、绵延至今。可以说,这是一则没有例外的铁律。

这里不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化积累,或者说如果没有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没有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叙利亚人等古代民族对希腊人的经济、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希腊文明能有它那出色的表现吗?它在科学、艺术、建筑、法律和“哲学”等方面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能够如此深刻地型塑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以及全球现代文化吗?伊斯兰、东正教、西方基督教等文明更是建立在次生文明基础上的次生文明,是在希腊、希伯来(从宗教角度看,与希伯来文化一体的犹太教是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亲体)这两个次生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明。

用通俗的话说,在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上,希腊文明是一个子代文明,^①或者说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的亲代文明。这就意味着,作为希腊(及叙利亚)文明的继承者,伊斯兰、东正教和基督教西方文明是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的孙代文明。在此意义上,希腊与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跟日本、朝鲜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相似,跟东南亚与印度、中国文明的关系相似,跟9至10世纪时的东斯拉夫人与拜占廷文明的关系相似,跟西元7世纪前阿拉伯半岛同两河流域、叙利亚文明的关系也相似。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希腊与埃及、西亚的关系是一种边缘

① 同样,希伯来文明也是一个子代文明,尽管这个子代文明与希腊文明一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亲体文明要素进行了为我所用的选择和利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文化更新。

与中心的关系,是一种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的关系。

以上的讨论,也能在世界体系论方面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世界体系论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在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三个“重要的中心”。有“中心”,就有相应的周边地区。在阿明的历史格局中,“中心”和“周边”分别为:(1)古代西亚世界,其周边为欧洲、小亚和非洲东部和北部等地;(2)古华夏世界,其周边为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区;(3)古代印度,其周边亦为东南亚。^①

阿明认为,在西元前300年至西元1500年这一千八百来年期间,西欧相对于文明世界的“周边性”或者边缘地位是“惊人的”;拜占庭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是“野蛮的”欧洲,只是由于“古代氏族式体系”^②被“嫁接”(通过罗马帝国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到一个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落后集体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体上,它才摆脱了绝对的落后;而只是在此之后,西欧才“缓慢地走向了氏族式体系,君主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徒‘收复’之后;在英法两国,是在百年战争开始后)就是证明”。^③

阿明的论点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能够将西元前4世纪末希腊霸权的兴起至西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落这六百多年时间排除在外,一幅更准确的历史画面便会呈现:欧洲相对于西亚的边缘性不只持续了一千八百来年,而且覆盖了西元前4世纪末前约一千三百多年(假定希腊文明约在西元前1600年时有了一个雏形),再加西元3世纪至16世纪这一千三百来年两大段时间。如果把这两段时间加起来,欧洲位处边缘的时间足足有二千六百年之久。

①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② 按,阿明所谓“古代氏族式体系”指的是古代西亚北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

③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26—27页。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一些内容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在《蒂迈欧篇》中,来埃及访学的梭伦发现,同埃及人相比,自己对“古代的事情”非常无知。为了引诱学问渊博的埃及祭司讨论“古代之事”,梭伦提到希腊人心目中的“人类始祖”福洛涅乌和大洪水之后幸存下来的丢卡利翁和皮拉,^①想要埃及人明白:希腊历史非常悠久。这时一位年迈的祭司对梭伦说:“梭伦呀梭伦,你们希腊人永远长不大,你们都是儿童……你们在心灵上全都是年轻的,在你们中间既没有从古老传统中沿袭下来的古老观念,也没有任何由于年代久远而变得古老的知识。”^②为什么希腊人永远长不大?祭司从地缘自然环境的角度给予了解释。他说,古时候“水灾火灾”使生活在山区和干燥地区的希腊人“遭到毁灭”,而自然条件优越的尼罗河却使埃及人“免受这种劫难”。^③结果是,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刚刚开始拥有文字和其他一些文明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从天而降的洪水又像瘟疫一般对你们进行扫荡,剩下的只是一些不懂文字、缺乏教化的人,于是你们又全都变得像儿童一样”。^④ 地缘自然环境甚至造成这么一种可悲的局面,即希腊人开不出文字和文明,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不得不由埃及人来代为书写:“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你们国家或我们国家……都会被我们的前辈记载下来,保存在我们的神庙里……你们只记得一次大洪水,可在此之前有过多次大洪水……那些浩劫的幸存者死后,许多个世代都没有能力写下一些文字传给后人。”^⑤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直至西元前 8 世纪,希腊人仍然对新巴比伦

① 福洛涅乌(Phoroneus)是希腊神话中所谓第一个人。希腊神话中还有这么一则故事:宙斯被青铜时代人类所做的坏事所激怒,发洪水消灭人类,结果只剩下丢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夫妻二人;洪水过后他们奉神命从肩后掷石头,丢卡利翁所掷之石变成男人,皮拉所掷之石变成女人,就这样重新产生人类。参《柏拉图全集》(四卷本,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三卷,第 273 页。

② 柏拉图,《蒂迈欧篇》,22B-C。此处译文出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下同。

③ 同上书,22D。

④ 同上书,23A-B。

⑤ 同上书,23A、23C。

王国无比敬畏和顺从也就不会感到吃惊。前 713 年,塞浦路斯有七个希腊酋长(basileis)来到巴比伦,向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朝贡。该事件被纪录在一则金属铭文中。该铭文提到,七个酋长的地盘“位于西边日落处七天路程以远之处”,“为朕(即萨尔贡二世)在迦勒底、赫梯的赫赫武功所震慑,深感恐惧,遂携其王国所产金器银器来巴比伦朝贡,亲吻朕足”。^① 此外萨尔贡二世的继位者埃萨尔哈顿(Esarhaddon,西元前 681—前 670 年在位)在尼尼微的新郊区大兴土木,也曾向西方小国——包括塞浦路斯的十个希腊酋长国——征集建筑材料。^②

明白了以上道理,我们不应该对这一事实感到困惑不解:直至西元前 4 世纪最后三十年来,大多数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最有名者为米利都、以弗所)大多数时候一直臣服于亚述、吕底亚、波斯等西亚强国,直至前 332 年亚历山大摧毁波斯帝国以后,才多少获得独立。有诸多证据表明,在前 8—前 7 世纪,腓尼基人广泛活动于爱琴海地区,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同一时期希腊人也活动于腓尼基的城市;晚至前 6 世纪,才有少量的希腊人渗入那里。^③

我们当然也不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大惊小怪:古代希腊最重要的两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及波斯国王时并不加“波斯”一类定语,而直接用 Ho Basileus(这个词可以译为巴赛勒斯、王侯、贵族、酋长、头人,但此处因无修饰语而显得特

① Edwin M. Yamauchi, *Greece and Babylon: Early Contacts betwee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 Baker Book House, Grand Rapids, Michigan (USA), 1967, p. 62.

② Edwin M. Yamauchi, *Greece and Babylon*, Baker Book House, p. 62. 前来新巴比伦王国朝贡的希腊国王的地位似乎低于历史上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在东亚朝贡体系崩溃之前,中国周边国家的国王或使者朝见中国皇帝虽然必须行三跪九拜之礼,但无需行屈辱的“吻足”礼。也不妨对这种现象这样的解释:比之萨尔贡二世之类的西亚帝国最高统治者,中国皇帝更为宽厚。

③ 这从《伊利亚特》第二十三卷第 744—745 行、《奥德赛》第十五卷第 415—476 行可见一斑;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还提到腓尼基人来自“卡德莫斯时代”的底比斯,也来自特拉岛和塔索斯地区。

别突出,故译为“国王”)来称呼。尽管在色诺芬《远征记》中,可以看到希腊将军色诺芬于前401年参加一支受雇于大流士二世的希腊雇佣军(后成为统帅),在波斯境内辗转运动,发现波斯已然衰落,不堪一击,但在此之前,希腊人即便在希腊本土两度击败波斯军队,对这个东方帝国仍心存敬畏。事实上,在争夺希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与斯巴达双方为了博得波斯人的青睐,多次竞相出卖同胞的利益和尊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在同一时期,希腊世界的边缘性也表现在所谓“哲学”诞生在小亚细亚西岸希腊人与东方人混居的城邦如米利都、以弗所,而非希腊本土。

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即“米利都学派”)全都来自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著名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5—前547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约前570—前500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前570—前500年)、赫拉克里特(Heraclites,前540—前480年)、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前570—前470年),无一不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人。此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生于前570年)出生在爱琴海东部靠小亚细亚海岸的萨摩斯岛,其思想成熟后才移居意大利南部;“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7年)也出生在小亚细亚西南角附近的科斯岛(Cos)。

甚至早在古代,普鲁塔克便已注意到希腊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曾前赴后继“留学”埃及:

在对待神圣事物方面,埃及人的智慧审慎到何等地步。这一点也被那些最明智的希腊人所证实,比如梭伦、泰勒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还包括吕库古(传说中的斯巴达大改革家)本人。他们都曾经到过埃及并与祭司们同吃同住。因此有记载说,欧多克索斯听过孟斐斯的克努菲斯(Chonupis)讲学,梭伦在塞易斯听过宋西斯(Sonchis)的课,而毕达哥拉斯曾经与太阳城人厄努菲斯(Enuphis)交谈。尤其是最后这一位希腊人,看来他与这些人惺惺相惜,

试图仿效他们的象征符号语言和神秘传授方式,而将自己的理论包裹在谜团之中。实际上,在所谓的圣书文献(按,指埃及宗教经典)和大部分毕达哥拉斯派的格言之间,并无任何区别。^①

还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奥运会的前身即西元前 776 年开始在伊利斯举行的四年一度奥林匹亚赛会,或其中最基本的比赛项目,也不是希腊人的发明,而极有可能是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那里“拿来”的。现存文献表明,赫梯体育运动很发达,在希腊崛起之前几百乃至上千年,便已有后希腊流行的大多数运动项目了。^② 另外,希腊人的主要乐器里拉琴(lyre)、希腊的重量单位米那(mina)、希腊贵族所喜欢的斜躺椅也不是希腊人的创新,而是前 8 世纪从东方“舶来”的(此前希腊人宴饮时笔直地坐着;柏拉图在《会饮》中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风流倜傥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如何色诱斜倚在躺椅上与朋友们喝酒聊天的苏格拉底,只是此时苏格拉底“美德”功夫已经很深,不为所动)。^③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除了用当时希腊世界仍明显落后于东方来解释,没有其他办法。希腊本土经济此时尚未充分发展,不足以哲学的诞生提供物质条件,而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因毗邻东方国家,其经济开发程度明显高于希腊半岛甚

① 普鲁塔克,《伊希斯与俄赛里斯》(段映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29 页。也见希罗多德《历史》,2·143(所用版本为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上下册);第九章“希腊的神与人”第十节“柏拉图身上流淌着诸神的血液”的相关讨论。

② Jaan Puhvel, “Hittite Athletics as Prefigurations of Ancient Greek Games”, 载 Wendy J. Raschke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The Olympics and Other Festivals in Antiquity*, Madison (Wisconsin, US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pp. 26—31.

③ Kelley Ross,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参 www.friesian.com/greek.htm, p. 7; 陈恒,《希腊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31—33 页、第 348 页; W. 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 800 — 400 B. C.*,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2, pp. 67—68; G. E. R. 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 页;也见 Charles Freeman, *Egypt, Greece and Rome: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1, p. 102.

至爱琴海上的希腊人岛屿,而相对发达的经济给哲学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但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东方在技术、文化、宗教思想甚至原初哲学思维方面都明显领先于希腊;由于同东方邻近,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和爱琴海东部的希腊城邦得以近水楼台地吸纳利用已有的东方文明成果;甚至晚至前 5—前 4 世纪古典希腊崛起之时,对于柏拉图这样的希腊人,埃及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如果说相对而言,西方人更乐意承认希腊艺术、文学、宗教受到了东方的影响,那么在坦承希腊科学也同样受惠于东方一事上,就不那么痛快了。这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似乎是硬证据仍然不多,主观方面的原因则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实,即便希腊科学直接受到东方影响的硬证据相对较少,也不妨从文明互动的宏观角度做一个基本判断:希腊文明因其后发性和次生性,在科学上受巴比伦和埃及影响是必然的,其可能性大大高于不受它们影响的可能性,甚至大大高于与这两个文明平行发展的可能性;反过来看,希腊科学影响巴比伦和埃及科学的可能性则小得多,如果真有什么影响,那也只可能发生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希腊文明与其他文明迅速融合时期及之后。

这种宏观判断无论如何是成立的。虽然在 1970 年代以前几乎一百年(188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西方科学史界仍普遍认为,科学是一个“希腊奇迹”,是由希腊人独自开出的,然而几代人的研究业已表明,科学上的“希腊奇迹”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希腊现象,而是“一个超出地区性的综合事件”。^① 通常以为,前 6 世纪米利都哲学家一科学

① 参 D.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自 D. Price, *Science Since Babylon* [Yale University, 1975]),石家庄市: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 页。某些并非专门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也注意到了早期希腊科学所受的东方影响。例如, W. G. Forrest 在其《希腊民主的兴起》一书中说:“米利都就从吕底亚或通过吕底亚吸收了更东边地区的系统思维方式;在充当埃及与希腊之间的商业和知识桥梁方面,它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他爱奥尼亚城邦的地理位置与米利都相似,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参 W. 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 800 — 400 B. C.*,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2, pp. 98—100。

家泰勒斯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准确预测了日蚀,但根据现存残缺不全的文献,根本无法确证他究竟预测了日蚀,还是在日蚀发生之后对之进行了解释;甚至存在这种可能性:他既没有预测到日蚀,也没有对之进行解释,而只是把巴比伦祭司的研究成果传抄到希腊。^①

但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天文学大成》(*Almagest*)。罗马时代的埃及希腊人克劳迪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于西元140年左右编撰了这部著作。它不仅是一部古代天文学“大成”,也是体现古代整个西亚地中海世界天文学、数学最高成就的科学“大成”。实际上,该书的编撰及后来人们对它进行的大量注释,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科学史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从几乎是原始的、简单的开端到《天文学大成》的高峰,以至后来的注释者们,对现象的理解和数学处理有着合理而明显的逐渐进化……有很多知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托勒密之前就已有了某些进展,许多文献告诉我们,这些人曾发现过什么和做过什么。”^②

那么,什么人“发现过”并“做过”什么?1880年代以来发现的大量巴比伦数学和天文学资料表明,“用楔形文字刻写的黏土书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时期至希腊化时代的塞琉古王朝……整个巴比伦数学和天文学的核心,是其运算上的极大便利性,这种运算包括大数据的和冗长复杂得让使用计算尺和计算器的任何现代科学家都想放弃的演算……例如,流量不同的多个水龙头向有漏眼的浴池注水的问题、代数上那些括号里套括号的多层括号倒换的问题(不过这里只用文字而不是用符号来说明——原作者)。”^③

在古代两河流域,由于统计畜群数量、计算谷物重量和测量土地面积的需要,巴比伦人很早便有了相当发达的数学。他们很早便知道“位值”

① Freeman,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p. 140.

② D.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自 D. Price, *Science Since Babylon*, Yale University, 1975),石家庄市: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③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2—13页。